

文苑春秋通笔书系



唐振常 / 著

繁弦杂奏

上海书店出版社

文苑春秋随笔书系

繁弦杂奏

唐振常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丛书策划：龚建星
责任编辑：剑箫
封面设计：程钢
封面版画：张德宝

* 文苑春秋随笔书系 *

繁弦杂奏

唐振常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42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曙光印刷厂排版 昆山亭林印刷厂印订	1997年5月第一版 1997年5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字数：190千字 印数：0001—5000
ISBN 7-80622-175-1/I·61 定价：14.00元	

目 录

小引	1
“无大臣之风”	3
张佩纶徒事空谈	7
张荫桓死得冤	11
立异以为高——说辜鸿铭之一	14
辜鸿铭“不全集”——说辜鸿铭之二	16
儒臣·大臣·功臣(上)——说辜鸿铭之三	19
儒臣·大臣·功臣(下)——说辜鸿铭之四	21
“贱种”袁世凯——说辜鸿铭之五	24
两部失而复得的近代史重要资料 ——兼为传播谬说自责	27
还是应听陈先生自己说	33
吴雨僧先生百年冥诞所感	36
今世古人	39
道高犹许后生闻	41
说白话文对联	44
从容自如一君子	49

寿蔡尚思先生	51
第一代职业外交家顾维钧	
——高克《外交家与战争》序	54
远远不止于震动	58
不谋其私	61
蜀中文化最关情	63
闻万里桥拆	67
“打鬼之战”掀起的时候	70
杭行所感	76
赏珍	79
上海研究断想三题	83
可比与不可比	88
风俗与文化	94
掌故之学	96
既丽且崇 名曰成都	98
国学可废乎	101
狗去猪来	103
春帆楼屈辱依在	105
中日之间耻何多	109
八年忆往	111
勿忘历史	113
历史如此论定	115
“我们在割稻子”	118
抗战促进化	122
战时学术重镇	125

当年大学城	127
师承与变法	129
典范之作	131
戏歌?!	133
闻厉慧良死	135
怪戏,怪得可爱!	137
移而不能植,何必移?	139
昆明之食	142
逃出昆明	144
鸡鸣狗盗之徒?	146
文责自负,如何?	149
大师其奈顽童何	152
《上海工运志》序	155
《浦东辞典》序	158
论史随笔	160
吴虞与青木正儿	175
风雨同舟忆《文萃》	203
早岁那知世事艰——自传之一	216
老年方悔读书迟——自传之二	262

小 引

这本集子收文甚杂，直白地说，可称为“杂乱无章之集”。现以《繁弦杂奏》为题，其义相同。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此乃大家气度，何敢攀附！弦而曰繁，视五弦为尤多，然所奏者杂，正状其乱，自不能有目送飞鸿之自若也。

大体而言，集中之文，无非谈文说史，所以初亦有以“文史谈”命名之意。继而一想，文史两个字，分开来意义明确；合在一起，有时或可能造成混乱。最让人说不清楚的是，自文史和资料连缀成词后，到底是什么意思，更难于明白。说是文和史的资料，或者文化史（或文学史）的资料，都不全然。颇有点落入上海时下流行语之所批评，近于在“捣浆糊”了，所以还是把文和史二者分开去解为好。集内所载自是文，复有谈文事之文，而集中确有谈史之文，亦搀有个别史学论文，此乃史。集中最后三篇文字，一篇应是回忆录，两篇为自传，三文皆奉命为之，只是个人琐琐，前尘梦影，时过境迁，可以个人之史目之，而非我所不敢为不能为的文史资料之文。除掉谈史与自述，大量短文，实是即兴所写的随笔。即使是这些谈史与自述之作，亦是野狐禅路道，出之以随笔的写法，非正宗也。

集中文章写作的时间跨度，远者在八十年代初，近者大量写于一九九五年，间亦收今年（一九九六年）之作。前者以篇论，数极少，而从字数看，远者之文皆长文，近之所作则几乎全是短文。于此，不免抚稿自叹：虽然居无书室，书籍资料散乱堆置，索检为难，亦复证年老力衰，血气之竭也。

一九九六年十月九日

“无大臣之风”

蒋梦麟曾被吴稚晖斥为“无大臣之风”。

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根据蔡元培的提议，设立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并试行大学区制，蔡元培任大学院长。大学区制执行阻碍重重，一九二八年又碰上中央大学校长易人之争，原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被大学院改任参事，以吴稚晖长中央大学，张乃燕为张静江之侄，张静江、李石曾起而反对张乃燕调任，国民党四老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分为两派，发生争执，吴稚晖亦不就任中央大学校长。蔡元培乃辞大学院长职，蒋梦麟继任大学院长，旋易名教育部，蒋梦麟为部长。中央大学易长纠纷仍炽，素长折冲尊俎的蒋梦麟亦无法应付，乃辞职。

辞职前夜，吴稚晖兴问罪之师，蒋梦麟在所著《西潮》中有一段生动的描写：“据吴老先生的看法，部长是当朝大臣，应该多管国家大事，少管学校小事。最后用手向我一点，厉声说道：‘你真是无大臣之风。’我恭恭敬敬的站起来回答说：‘先生坐。何至于是！我知罪矣。’第二天我就辞了职。……刘半农教授闻之，赠我图章一方，文曰：无大臣之风。”蒋梦麟出以轻松调侃的笔墨描绘此事，仍掩不住一丝苦笑。

蒋梦麟此文似隐隐含有经吴稚晖一点点明了自己的去就之意。蒋梦麟是蔡元培的学生，多年以来，又是蔡的得力助手，蔡既去，蒋自难留。蔡元培苦心建构的大学区制，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为国民政府明令停止。

照吴稚晖的说法，大臣之风是多管国家大事，大学校长易人是小事，不必去管，这自然说得太轻易了，此老一向说话随便，往往有哗众取宠之心，人不以为异。大学校长易人而云小事，教育部长也就没有多少大事可管了。此老如得见我们今日大学校长所管一个大学林林总总的杂事之多，当不知他的手指要点向多少人，而金石家将刻多少“无大臣之风”的闲章以送各位校长了。

大臣之风，到底如何定义，恐怕谁也说不清楚。辜鸿铭谈到大臣之度，所说其实也是大臣之风，他倒是有其说法，然亦只是例以明之，没有下定义。他说：“当咸同间，中兴人才除湘乡曾文正外，皆无一有大臣之度，即李文忠亦可谓之功臣而不可谓之大臣，盖所谓大臣者，为其能定天下之大计也，孟子所谓‘及是时修其政刑者也’。”他说到太平天国既平，大计不外“办善后”与“御外侮”二端，“办善后姑且不论，至御外侮一节，当时诸贤以为西人所以强盛而狎侮我者，因其有铁舰枪炮耳。至彼邦学术制度文物，皆不过问，一若得铁舰枪炮即可以抵御彼族。此文正公所定御侮之方略也，亦可谓陋矣。”辜鸿铭在一篇题名《大臣远略》文章中，亦述此意。他赞扬文祥“独设同文馆，欲培洋务人材，以通西洋语言文字学术制度为销外患之要策。由此观之，文文忠之远略，有非曾文正诸贤所可及也。”辜论之失，在提了一方面，忽略了另一方面，和他所批评的曾国藩、李鸿章犯同样毛病。且以辜的思想推延下去，中华学术制度文物是至矣尽矣，亦无须兼融西学。

所以他才有儒臣与大臣之论。按辜说：“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致于无政也。当同光间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于李文忠者，非不满意李文忠，实不满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计也。”虽然誉曾国藩为大臣，弯来绕去，一番议论，所定天下之大计既误，还能称做大臣之度吗？

然而，辜鸿铭的议论还是可以发人深思。他批评李鸿章，“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才能而不论人品。”这确实揭到了李鸿章的短处。李鸿章一生讲权变，几于不择手段。《异辞录》一书作者刘体仁，是曾官至四川总督的刘秉璋的儿子。刘秉璋出于淮系，与李鸿章有通家之好，《异辞录》屡言及此，亦屡颂李，然于多处亦不免对李有微词，如言李鸿章免于舒城之难后，返乡助其父办团练，“不免募捐，乡人为之揭帖（今之大字报也）云：‘翰林变作绿林。’”其实是指李氏父子诈财。如言“文忠治军，不使诸将和睦，预防其协谋，为主帅害。”“文忠常述中丞（振常按：指安徽巡抚福济）之言曰：‘时时以不肖之心待人。’”勿庸多举，李鸿章权变之相显见，其何以具大臣之风？辜鸿铭对此下一结语说：“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于是，辜鸿铭寄希望于儒臣张之洞，而张之洞在中法战后亦效西法，由清流而变为后期洋务名臣，辜鸿铭虽强设词为张之洞解，亦不免于言之不能成理，乃兴无穷的浩叹。

究竟怎么样才够得上大臣之风？李斯《谏逐客书》讲国君的大度容人，“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这是王者之

风，移用之于大臣，亦自适当。然而李斯毕竟身当遭逐，为求容，乃发此议，终非全面之论。中唐名臣郭子仪，身系天下安危，司马光写他，“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忌，穷奢极欲而人莫非之。”写了一个得众心的大臣，而于大臣之风无涉，只是说他的威望之高。

吴稚晖所谓大臣少管小事，辜鸿铭持论极不相同。辜鸿铭的同乡故友蔡毅若，幼年入广东同文馆习英文，与诸同学入馆之日，在门首有一长髯老翁欢喜迎人，导游各处，并加讲解。又问大家吃了饭没有，答说未曾，“即传呼提调官，旋见一红顶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诸生始知适才所见之老翁乃今日当朝之宰相文中堂也。于此想见我朝前辈温恭恺悌之风度也。”这位文中堂（即名臣文祥）亲自迎新生入校，管吃饭，自然是管小事了。他又是辜鸿铭誉为有远略的大臣。那么，辜鸿铭理解的大臣之风，当是对青年“温恭恺悌”没有架子和具远略兼备了。岂其然欤？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八日

张佩纶徒事空谈

周劭先生有文章谈张荫桓(文见《文汇报》),言及张爱玲曾误以荫桓为她的祖父,周纠之。这真是数典忘祖。张爱玲的祖父乃张佩纶,此张非彼张,张荫桓是广东南海人,张佩纶是河北丰润人。荫桓字樵野,佩纶字幼樵,二人只有一个樵字相同,张爱玲或因此致误耶?亦太牵强。

提起张佩纶,倒是有话可说。鼎鼎大名的清流党,颇令时人倾倒,辜鸿铭的《中国的牛津运动》(香港牛津出版社出版,南星译),于他推崇备至。他和黄体芳、宝廷、张之洞,在光绪年间,有“翰林四谏”之称,“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无论是言官非言官,论政总是应该,言官而不事纠劾,即为尸位素餐,空负其名。张佩纶久在翰林,累疏陈经国大政,真有一番雄图。

在清流党人中,佩纶以纠弹大臣著一时,是一位敢摸老虎屁股的极谏之士。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都是被他劾罢的。佩纶最著名的举措,是三劾枢臣王文韶。光绪八年,云南报销案起,王文韶时掌户部,谏官争疏王受贿,光绪对王情意正隆,不作处置。张佩纶疏请令王避嫌乞养,不报。又接连两次疏劾,王文韶终以失察罪夺二级,乞养归。张佩

纶被任左副都御史，成名正言顺的言官了。此时，中法之间在越南不断发生事故，佩纶接连上章十余次，书生论兵，大言不惭。大约就因为这十几道奏章声势夺人，光绪十年，中法战启，他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时人以为，“以词臣而任军役，此异数也。”

这位纸上论兵的张佩纶，有些昏昏然，自以为懂得军事，做法令人大异。到福建船厂后，居然以十一艘战船环列一起以保卫他，颇有曹操连环船之遗风。各船管带告诉他这样不行，他把这些人轰了出去。后法舰齐集，发来战书，部下军将知道战将不免，请他速作准备，又被他骂了出去。直到看见法舰升火开动，这位主将才觉不对，大怖。妙在他仍不作迎战的布置，而是派他的学生魏瀚去通知法舰：“慢一点打。”此公军事知识，似皆从演义中看来，全不知现代战争为何事。魏瀚未到法舰阵地，炮声大作，张佩纶“所部五营溃，其三营歼焉。”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吃了大败仗。佩纶逃到鼓山脚下，乡人拒之，他还大摆官架，说是：“我会办大臣也。”乡人照样不买帐，只好逃到彭田乡去。即使在这种惨败逃遁情况下，他还向朝廷报告假军情，得到了赏赐，并受命兼福建船政。妙在这位败军之将上疏请恤马江死事诸人（这些兵将都因他的不战、无备而死）竟厚颜说：“李长庚死事于闽洋，而其部将邱良功等，卒平海盗。曾国藩初覆师于湖口，而其后遂为中兴第一功臣。此固人事之平陂往复，抑亦天心之草昧艰贞。”文人弄笔，厚颜无耻，于斯极矣。

朝廷终于知道了马尾兵败之事，初对他也很有宽容，只是夺去三品卿衔，下吏议处。福建人大愤，闹了起来，于是有编修潘炳年、给事中万培因等先后奏其罪状。在此之前，佩纶已因为错荐唐炯、徐延旭褫职，至是再论充军。

在朝舞文弄墨，劾人痛快淋漓（自然，直言参劾恶吏自

是可取),论兵颇像回事;及至临阵,慌乱无策,其所作为,俨然第二个叶名琛。徒事空谈,有害实际,此清流党人在局外说风凉话与入局之后之所为也,空谈引来高名,入局则败下阵来。

当败之时,何如璋督福建船政,也是敌至不战,败了就跑,跑到彭田乡依佩纶,佩纶怕敌人侦查到,把他骗走,时人有联讽二人云:“堂堂乎张也,伥伥乎何之?”未战之先,佩纶常作大言,谓败当以三钱鸦片殉难,及败,携豚蹄途中大嚼,于是时人为联曰:“三钱鸦片,死有余辜。半个豚蹄,别来无恙。”一贯骂人,今番被人骂苦了。

张佩纶的后半生没有结束,充军边疆召回之后还有演出。他本是李鸿章的门生和幕僚,又为李府西席,戍边回来之后,再入李幕,李鸿章以女妻之,时人讽之曰:“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无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孽海花》有一节写张佩纶(小说中化名庄仑樵)与李鸿章女婚事,谓鸿章小女爱慕佩纶,佩纶被责,鸿章女独赞之,写了两首诗,放在其父房中,被佩纶谒鸿章时看见,大为动心,因成婚姻。李女二律引如下:

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战岂容轻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车我自宽房琯,乘障谁教使狄山。
宵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痛哭陈词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卿。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宣室不妨留贾席,越台何事请终缨。
身冠寂寞犀渠尽,功罪千秋付史评。

自然是小说家言，诗亦劣。

马江战败，时人攻及鸿章，鸿章没有想到佩纶在战场如是丢脸，受辱如是之深。佩纶毕竟有学问，战败后对鸿章自称贱子，用杜甫“贱子因阵败”句也。有人借此讽之云：“箕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虽云近谑，亦纪其实。

甲午战起，此公不甘寂寞，有些小动作，御史端良劾其干预公事，命逐回籍。庚子议和，老泰山李鸿章荐其编修佐办和约，既成，从此称疾不出，在南京过了几年安静也是寂寞的生活，过去同为清流的张之洞时任两江总督，一阔脸就变，不但不和张佩纶往还，且要人叫他离开南京。张佩纶大怒，大骂张之洞欺人。他于光绪三十四年死去。甲申一败，同为清流的旧友，势不能为张佩纶辩，而娶了清流最恨的李鸿章之女为妻，为清流旧友所不屑，这就是张佩纶的末路。以视另一张（荫桓），虽被杀头，却有作为，佩纶不如远矣。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四日

张荫桓死得冤

张荫桓捐班出身，居然练就一身本领。他的事业主要在外交。或者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事，或者出使外国，以能干出名，颇有成就。如任出使美日秘三国大臣，在美为被杀华工争财产赔偿，得墨银十四万七千余，解决了前使郑藻如久争而不得决的事。美政府虐待华工，欲以此致禁遏，荫桓认为系命他族，不如不与通，乃倡自禁华工之议，这也是一种以我为主的立场。甲午战后，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会议中日商约，荫桓能够力争，成通商行船二十九款。

如此等等，荫桓被称为知外务。但是，荫桓一大毛病是揽权，《清史稿》本传出以一语：“驽蹇巍官，务揽权，为同列所忌。”莫详其内容。揽权便不让众人，不让众人则必恃才傲物，唯我独尊。《异辞录》有一段记载，颇可参照：

张樵野侍郎，久为李文忠之门生下吏，外简公使，内擢卿贰，皆文忠之力。侍郎以吏员出身，而吐属风雅，亚于词林。临事明敏，邻邦人士，咸乐为欢。兼权译署，居高而愈见才，岁久而益习事，都人共仰及。文忠入署，相形之下，既尊且亲。侍郎揽权有年，不能复让，遇事把